

利奥三世时期海军制度变革初探

胡长江,张 业

(聊城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利奥三世统治时期处于拜占庭帝国历史转折的关键期。在击败入侵的阿拉伯军队后,利奥三世针对拜占庭海军展开了一系列改革。他废除了传统的卡拉比西安舰队,改革海军支出、创新海军体系、完善海军军备,最终建立了基比拉奥特海军军区。在随后的海上作战中,基比拉奥特军区数次击败阿拉伯帝国海军,并且重新夺取了地中海地区的海军霸权。利奥三世的改革也存在一些缺陷:就海军在帝国军队中总体地位而言,改革后海军仍是陆军的附属;在海军战略上,尽管多次击败阿拉伯海军,但拜占庭海军仍然以守势为主;同时,利奥三世也缺乏对海军装备的革新。

[关键词]利奥三世;拜占庭海军;卡拉比西安;基比拉奥特

[中图分类号] K545.3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0215(2023)04-0075-08

引言

公元7世纪,随着萨珊波斯与阿拉伯帝国的连续入侵,拜占庭帝国进入历史上的“黑暗时代”^①。为赢得这场生存斗争,利奥三世(Leo III the Isaurian, 675—741)抓住时机,针对海军展开大刀阔斧的改革,改革的标志就是卡拉比西安(karabisianoi)舰队的解散与基比拉奥特(Cibyrrhaeots)军区的建立。

利奥三世时期海军制度的改革对拜占庭帝国影响深远,使得原本定位模糊、战斗力低下的卡拉比西安海军,转变为拥有固定管理区域、清晰的管理结构以及高强战斗力的基比拉奥特军区,随后数次击败阿拉伯帝国海军,并且重新夺取了地中海地区的海军霸权,使拜占庭人在黑暗时代再度看到希望,但是就海军在帝国军队中总体地位而言,改革后海军仍是陆军的附属。在海军战略上,尽管多次击败阿拉伯海军,但拜占庭海军仍然以守势为主,同时利奥三世也缺乏对海军装备的革新。纵观拜占庭帝国历史,可以看出利奥三世的海军制度改革,在短期上确实帮助拜占庭帝国重获地中海制海权,但不管是在海军技术方面还是在海军战略战术方面,帝国仍缺乏突破性变革,利奥三世时期拜占庭帝国海军的辉煌已是最后余晖。

笔者不揣窥陋,以相关史料为基础,结合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以伊苏里亚王朝时期利奥三世的海军改革为切入点,力图对8世纪拜占庭帝国海军改革的具体背景、内容及其局限等问题做些浅显研究,略陈管见以就教于方家。

一、利奥三世改革前的海军制度及改革背景

利奥三世改革前,拜占庭帝国的海军制度主要体现在卡拉比西安舰队身上。卡拉比西安是公元7世纪中期到8世纪初,拜占庭帝国为对抗阿拉伯帝国在海上的扩张而设立的帝国历史上第一支永久性海军。

[作者简介]胡长江,聊城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拜占庭史。

关于卡拉比西安的起源,史家意见不是很统一,众说纷纭。约翰·哈尔登在《拜占庭世界的战争、国家和社会,565—1204》中,认为它是查士丁尼一世设立的军区监区(*quaestura exercitus*)的残余;^{[1]74}沃伦·特里高德则在《拜占庭国家社会史》中,认为它是由伊利里亚野战军演变而来的。^[2]关于舰队的建立日期同样也有争论,约翰·内斯比特在《南巴尔干半岛、群岛、小亚细亚南部》中,认为它是由康斯坦斯二世在655年船桅之战(*Battle of the Masts*)以后,于7世纪50年代或60年代建立的;^{[3]150}而阿尔韦勒·海伦娜则在《拜占庭与海洋:7至15世纪拜占庭的海军、政治和海事机构》中,认为它是在678年君士坦丁堡保卫战之后创建的。^{[4]22—23}史料中第一次提到卡拉比西安是在680年斯拉夫人围攻帖萨洛尼卡期间。^{[4]19—20}目前,由于史料缺乏,卡拉比西安的起源可以说仍是未解之谜,在此就不做深究。

当时帝国海军由三部分组成,分别是驻扎在君士坦丁堡的帝国中央舰队、驻扎在外省基地的卡拉比西安舰队、隶属于地方政府的巡查舰队。^{[5]99}帝国中央舰队在击退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尚不清楚当时是否作为独立机构存在。根据海伦娜·阿尔韦勒在《拜占庭与海洋:7至15世纪拜占庭的海军、政治和海事机构》中所推论:据乌斯宾斯基职官录(*Taktikon Uspensky*)记载,作为帝国首都舰队(*basilikon ploimon*)首领的 *droungarios tou ploimou* 首次被提到是在842/843年,并且几乎没有证据表明8世纪君士坦丁堡存在驻扎的主力舰队,因此帝国首都舰队的创建日期应在9世纪初。^{[4]73—74}据此,笔者认为,在首都舰队正式创设前,卡拉比西安应作为主要舰队,负责组成中央预备队和各种远征舰队的核心,同时承担保卫帝国东地中海区域领地的任务。卡拉比西安的领导组织构成与后来的陆上军区可能大致相同,同样由于资料贫乏,我们只知道是由一个将军(*stratēgos*)领导,^{[4]24—25}其具体组织结构应类似于古代罗马海军的“都督一百人队系统”,^②其驻地尚不清楚,约翰·哈尔登认为是罗德岛,^{[1]74}而约翰·普赖尔和伊丽莎白·杰弗里斯则认为驻地为萨摩斯,^{[6]25}我们倾向于约翰·哈尔登的观点。卡拉比西安海军的任务侧重于保卫乞里奇亚^③与叙利亚海岸,^{[1]74}而罗德岛无疑比萨摩斯岛更加接近这片海域,萨摩斯岛可能是用于执行保卫君士坦丁堡任务时的临时驻地。

当时帝国高级军官来源主要有二:

首先,是来自军区/行省的大家族成员,例如杜卡斯(*Doukas*)、斯克莱鲁兹(*Skleros*)和福卡斯(*Phocas*)家族,在8世纪到10世纪后期此类现象最为明显。这些家族倚仗其拥有的庞大地产,通过帮助家族成员担任地方长官的方式进一步保持权力和财富优势。

其次,则是来自较不富裕但受皇帝赏识的群体。在行省中,前者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士兵们更信任那些能力和素质为人所称道的同乡军官,而不是中央任命的外乡人,^{[1]260}因此大多数舰队指挥官只能依靠更有经验的专业下属来获得航海知识。^{[6]393}

卡拉比西安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三:

首先,防护作用有限。卡拉比西安海军被视为主要的地方舰队,任务是保卫自小亚细亚南部海岸到乞里奇亚的塞琉西亚、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南部的帝国领地,^{[4]33—34}然而面对阿拉伯海军对君士坦丁堡的数次围攻,卡拉比西安海军势必放弃对地方的保护转向护卫首都,从而使得地方上的海军防护削弱,为给阿拉伯人的袭击创造机会。同时,帝国在西地中海区域的领地又不属于卡拉比西安的守卫范围,因而帝国对除首都海域外的地中海海域都缺乏有效控制。

其次,海军曾多次拥兵叛乱。668年,康斯坦斯二世在叙拉古被谋杀后,卡拉比西安拥立篡位者美泽兹乌斯(*Mezezius*);697年,皇帝利奥提乌斯(*Leontios*, 694—698)派遣卡拉比西安参与夺回迦太基的行动,次年阿拉伯军队的猛攻下帝国最终放弃迦太基,这次失败导致卡拉比西安海军起义反叛利奥提乌斯;727年,在基克拉底群岛反对皇帝利奥三世圣像破坏运动(*Iconoclasm*)的叛乱中,也有卡拉比西安的身影。六十年内,卡拉比西安海军至少参与了三次反抗正统皇帝的叛乱。

最后,海军的实际战斗力有限。自阿拉伯帝国发动入侵以来,拜占庭大量领土的沦陷使得国家收入锐减,帝国难以组建大规模的海军。同时,皇帝们数次海外军事冒险的失败又使得舰队规模不断缩小,由此进

入一个恶性循环:对外作战的不断失败加剧财政困难,而财政困难使得帝国难以重整海军,从而增加失败的可能性。在希腊火这一突破性的发明出现前,可以说卡拉比西安海军难以找到优秀的作战范例。

有一点必须要强调,那就是“卡拉比西安”与传统意义上的军区(themes)并不相同。军区制亦称塞姆制,是拜占庭帝国7—12世纪的一项重要制度。它是拜占庭帝国从早期转向中期的重要标志之一,为帝国的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军区制以农兵制、军政合一为重要特点,并由将军(strategos)对行政区域及其军队进行管理。^[7]虽然卡拉比西安经常被称为“卡拉比西安军区”^④,但这个名称是错误的,^{[3]150}因为卡拉比西安海军是一个纯粹的军事系统,它并没有像军区那样的陆上专属领地。同时,我们也没有资料可以证明海军士兵或者其亲属拥有军役地产,所以卡拉比西安不能称为“军区”。

阿拉伯人的入侵和拜占庭海军的数次反叛,构成了利奥三世时期海军制度改革的主要背景。644年,阿拉伯人在拜占庭夺回亚历山大港行动中见识到了海军的效用后,立即着手组建海军,这一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被征服的黎凡特地区^⑤的资源。^[8]由于缺乏14世纪前的插图,我们对早期穆斯林军舰的细节一无所知,但鉴于两种文化之间长达几个世纪的互动与借鉴,比如拜占庭的军事手册,在翻译后就可以由阿拉伯海军统帅使用,所以史学家通常认为阿拉伯海军借鉴了已有的拜占庭海军模式。^{[9]83}7世纪80年代,查士丁尼二世重新将注意力转移到海军上来。皇帝特地将18500名左右的马尔代特人^⑥重新安置在帝国南部海岸,以作为海军陆战队员与桨手,^[10]但是迦太基救援失败后的内战迫使海军重整计划停止。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却在大力推进本国的海军建设:阿拉伯总督穆萨·本·努赛尔(Musa bin Nusair)在突尼斯建造了一座新的城市和海军基地,并带来1000名埃及造船工人建造新舰。8世纪初开始,穆斯林对拜占庭在西地中海的领地特别是对西西里岛不断展开袭击。此外,这支新的舰队也帮助阿拉伯帝国完成对马格里布与西哥特王国大部分地区的征服。^{[6]28}在阿拉伯帝国积极吸收帝国海军经验、扩张舰队夺取地中海海权之时,帝国却忙于内斗、无暇顾及。726年,利奥下令拆除君士坦丁堡大宫殿入口前厅的基督圣像,从而引发了破坏圣像运动。727年,希腊与基克拉迪斯群岛的舰队宣布另立皇帝,并在君士坦丁堡附近流窜,正是这次叛乱给了利奥三世充分的理由来进行海军改革。

二、利奥三世时期海军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基比拉奥特是拜占庭帝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海军军区,该军区从8世纪早期延续到12世纪晚期。在9世纪爱琴海和萨摩斯的军区从其指挥中独立出来前,基比拉奥特军区是帝国唯一专业化的海军军区。^{[3]151}基比拉奥特海军军区正是利奥三世在位期间,在拜占庭帝国原有的海军制度基础上变革而来。利奥三世对海军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细化组织、约束军权、优化海军职能区域及海军规模与海军战术、改革军费以及设立新型战舰等多个方面。

首先,利奥三世以类似陆上军区的职务体系来构建基比拉奥特军区,以达到细化组织、约束军权的目的。海军军区最高将领的常用称谓是将军(Strategos),这与统领陆地军区的将军是同一单词。在将军之下是两三个中队长官(tourmarchai),中队长官之下是一些营队长官(droungariois)。将军最重要的下属包括西莱翁的营队长官,阿塔利亚和科斯的营队长官以及指挥军区中的马尔代特人的营队长官。^{[1]199}将军还兼任其军区的总督,在政务方面他们由领导军区民政管理的首席秘书(prōtonotarios)协助。其他参谋人员有负责舰队管理的簿吏(Charthoularios),担任参谋长的首席信使(prōtomandatō)以及一些参谋伯爵。^{[4]64—65}军区在爱琴海的区划则由两个独立的海军司令部负责,每个司令部都由一个营队长官领导:一个负责爱琴海北半部以及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另一个负责十二岛以及包括基克拉泽斯群岛在内的爱琴海南部。这两个军区的droungarios同时行使民事和军事权力。作战舰队是由许多海军中队组成,每个海军中队包含3到5艘船,受komēs或droungarokomēs指挥,而每艘船的船长被称为百夫长(kentarchos)。在船长的领导下,根据其船只规模的大小,由一到三个核心人员组成的领导层负责指挥,有担任执行官的旗手(bandophoros),两名称为船长(prōtokaraboi)的舵手以及一名船头军官(prōreus)。^{[6]275}每艘船上也会有几种轮值工作,在这些工种中

任职的大多数人是从小队中被提拔的,比如第一桨手(*prōtelatai*)。船上也有许多专门性人才,例如船首桨手,他们负责处理用于释放希腊火的虹吸管。资料中还记录了一位小号手(*boukinatōr*),他负责向划船士兵传达命令。^{[6]268—273}值得注意的是,为防止军官擅权叛乱,利奥三世开始将舰队的平时指挥权收归中央。

其次,在优化海军职能区域以及海军规模战术方面,利奥三世侧重于防范阿拉伯人的入侵。基比拉奥特军区所含范围包括小亚细亚南部海岸从米利都南部到基利西亚包括卡里亚、利西亚、旁非利亚和伊索里亚在内的部分行省以及现代的多德卡尼斯群岛。虽然这片土地以肥沃而闻名,但作为处于前线交战地带的军区,地理位置使它直面穆斯林舰队的攻击。因此,军区的补给必须依靠防御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军事基地,而不是缺乏有效防御手段的农村。^{[11]1127}关于基比拉奥特军区的整体规模,由于缺乏资料,同时军区的实际规模经常根据帝国人力后勤条件而变动,使得我们只能列举9世纪后的数据:9世纪早期时军区舰队由70艘船组成;911年的克里特岛远征中,军区则派出了由15艘大型战舰和16艘中型战舰组成、拥有6000名桨手和76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联合舰队。史料中最后一次提到基比拉奥特军区的舰队,是在1043年击退基辅罗斯海军的保卫战中,那时军区变成了一个纯粹的民事省。^{[11]1127}1071年曼济科特战役(Battle of Manzikert)后军区的大部分领土被塞尔柱突厥人占领,虽在阿莱克修斯一世(Alexius I, 1081—1118)统治下光复,但最终被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1143—1180)废除,领土划归米拉萨与米兰奴迪翁军区(Thema Mylasa kai Melanoudion)。^{[4]273}

再次,关于利奥三世时期海军军费改革,由于缺乏8世纪利奥三世在位期间的相关资料,我们只能根据现有的材料来推测在帝国等级制度下的军官薪酬问题。根据《仪式书》(*Book of Ceremonies*)中对拜占庭高级军官薪酬清单的记录:从安纳托利孔、亚美尼亚坎和斯拉卡洪的将军开始,依次是奥西孔、布卡拉里翁和马其顿的将军30磅,卡帕多基亚、查西亚农、帕弗拉哥尼亚和色雷斯的将军20磅,直到萨摩斯和爱琴海的斯特拉戈伊将军10磅。^{[1]128}根据10/11世纪的尼基塔斯印章所示,作为基比拉奥特军区的佩剑白衣选士(*spatharokandidatos*)与行政官员(*chartoularios*)的尼基塔斯,他的年薪是10磅黄金。在842/843年的乌斯宾斯基职官录(*Taktikon Uspensky*)中他的位阶排名第25位,在971—975年的拜占庭百官志(*Taktikon Escorial*)中排名第55位,由此可见,尽管基比拉奥特军区在帝国等级制度中的总级别相对较低,但薪酬仍然高于一般指挥官。^{[6]390—391}对于普通军官和士兵,利奥三世则根据服役时间长短,工资从18诺米斯玛到12诺米斯玛或更少。普通的马尔代特士兵每人每年获得3个诺米斯玛的酬金;而来自东部边境的士兵每人只领到2个诺米斯玛。从7世纪后期开始,某些军区士兵依靠他们的家庭获得食物、武器和其他装备,其直系家属凭借军人身份获得某些财政特权,确保了这种模式能够长期存在发展,而从660年开始军队现金工资已经减少到象征性和偶尔性的数额。正如后来的阿拉伯资料以及可用的钱币材料表明的那样,这些士兵通常是自己承担薪酬,按报名季节登记成册,并在需要时被征召。8世纪的证据表明,一些省级士兵负责自己准备武器和装甲。值得注意的是,君士坦丁堡军械库除外,军械库和负责军械库的政府部门似乎是舰队和军队的主要仓库和供应商,他们仍受中央财政支持。^{[1]122}由此笔者认为,利奥三世可能利用军区演进的趋势,将原本用于士兵薪水的资金节省下来以便服务于海军军械支出。在帝国存在期间,普通水手大多由下层出生的自由人组成,他们是职业军人,通过义务服兵役(*strateia*)以换取薪水或土地财产,^{[1]267}有时战俘和外国人也使用。除马尔代特人之外,克里特岛探险队中还出现了一个名为达尔马提亚人(*Toulmatzoi*)的神秘团体以及许多的罗斯人,10世纪的一系列条约赋予了他们在拜占庭军队中服役的权利。^[12]

最后,利奥三世注重设立新型战舰及创新战术。海军的主要战舰是由古代罗马帝国舰队轻型战舰利布尼亚(*liburnian*)演变而来的德罗蒙(*dromōn*)战舰。*dromōn*一词首次出现在5世纪后期,到6世纪通常用于特定类型的战舰。^{[6]123—125}6世纪的普罗科比乌斯描述的德罗蒙是大约50个桨的单岸船,每侧排列有25个桨。^{[6]125—126}根据一些学者描述,早期的德罗蒙与利布尼亚不同的主要特征主要有三:全甲板(*katastrōma*)、放弃船头的撞击装置转而使用水上尖刺、引入三角帆。^{[6]127}放弃船头的撞击装置的确切原因尚不清楚,^{[6]138—140}根据普赖尔和杰弗里斯的分析,这种变化的发生可能是由于榫卯船体建造方法逐渐演变为骨架优先方法,因

为该方法造出了更坚固、更灵活的船体,从而不易受到撞锤攻击。^{[6]152}到了7世纪初,撞击装置的原始功能已经被遗忘了,根据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⑦(Isidore of Seville, 570—636)的评论,当时它们是被用来防止与水下岩石碰撞。^{[6]134—135}至于后来加入的三角帆,过去许多史家都认为它可能起源于印度,之后由阿拉伯人引入地中海,然而近几十年新资料的发现使得学者们将三角帆的出现提前到希腊化晚期或罗马早期。^{[13]357}贝利撒留的作战舰队部分配备了三角帆,因此利奥三世时期的三角帆很可能已成为德罗蒙的标准装备。^{[13]64}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随着与阿拉伯人的海军斗争加剧,拥有两排甚至三排桨的重型德罗蒙开始发展起来。^{[5]10}据说重型德罗蒙拥有更多的船员,包括230名划船者和70名海军陆战队员。约翰·H·普赖尔(John H. Pryor)认为他们是编外船员,而克里斯托斯·马克里普利亚斯(Christos Makrypoulias)则认为,这些编外船员对应每个桨的预备水手。^{[6]165}尽管当时的船只大多数只有一个桅杆(histos/katartion),但重型德罗蒙可能需要至少两个桅杆才能有效行动。^{[6]238}该船由船尾的两个舵(prymnē)操纵,该舵位还装有覆盖船长泊位的帐篷(skēnē)。^{[6]215}船头(prōra)具有一个升高的前艏,在前艏下方突出了用于释放希腊火的虹吸管,^{[6]203}在船两侧中部可能有第二个虹吸管。^{[1]189}沿着船的侧面有一个围栏(kastellōma),海军陆战队员可以在上面挂盾牌,保护船员。^{[6]282}较大的船只在桅杆之间的两侧也有木制城堡(xylokastra),为弓箭手提供高架射击平台。^{[5]104}船首支刺(peronion)瞄准敌舰的船桨,负责破坏它们,使得敌舰对射击和登船行动无能为力。^{[6]143—144}有着三排船桨的德罗蒙在9世纪的一部赞美大内侍(parakoimōmenos)瓦西里·尼科普鲁斯(Basil Lekapenos)的作品中有所描述,然而这篇论文大量引用了古典时代资料,真实度存疑。^{[6]284—286}到10世纪为止,德罗蒙战舰主要有三类:1.ousiakon: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为它由108名ousia驾驶。2.Pamphylon:船员多达120—160人,它的名字暗示其起源于潘非利亚地区的运输船。^{[6]189—192}3.galea:较小的单层船,约有60名船员,用于侦察任务,但也用于战线的两翼。^{[6]190}罗马人通常征用普通商船作为运输船(phortēgoi)或补给船(skeuophora),但也会使用海军运输马匹。海军运输船的代表就是切兰迪翁(Chelandion,德罗蒙的衍生型),切兰迪翁必须在船中部有一个特殊的隔间来容纳一排马,从而增加其横梁和保持深度。^{[6]449}

在战术上,当面临战争时,由桨帆战舰组成的战斗舰队和负责运输的辎重部队(touldon)组成的舰队首先在沿海基地(aplēkta)集结。发生战斗时,辎重部队将被送走,而战斗舰队被划分为中队,命令通过信号旗(kamelaukia)和灯笼在船与船之间传递。^{[6]394}根据利奥六世的说法,帝国海军会使用各种策略,例如进行侧翼突袭、假装撤退或伏击。半月形阵型与直线阵型似乎是常态。^{[14]164}根据具体情况,有一系列的变体和其他战术和反战术可供选择。当处于舰对舰作战的状态时,主要手段是跳帮战和投掷物攻击,^{[14]164}船只配备了小型弹射器(mangana)和弩炮,用以发射石头、箭、标枪、希腊火罐或其他燃烧液体甚至利用蝎子、蜥蜴和蛇。^{[6]509}海军陆战队和跳帮桨手则装备了近战武器,如长矛和剑。其他水手身穿软垫毡夹克(neurika),使用弓和弩进行战斗。^{[6]381}在足够接近敌舰时,投掷物的攻击就开始了,使得在登船行动之前耗尽敌方船员的队伍。^{[6]402}一旦指挥官判断敌军兵力已经大幅度减少,舰队就合围起来为海军陆战队和跳帮桨手登上敌舰进行肉搏战提供条件。^{[9]102—104}

三、利奥三世时期海军制度改革评述

利奥三世时期的海军制度改革,是在外有压力、内有动力的背景下进行的。改革一方面大大增强了拜占庭海军在抵御阿拉伯人入侵时的战斗力,保卫了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安全;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拜占庭海军自身的弊端,把海军指挥权收归中央,避免海军落入某些将军手中,以拥兵叛乱,反抗皇帝。只是在海军地位、海军装备等方面,利奥三世的海军制度改革仍然没有突破性的改变。改革后的拜占庭海军仍隶属于陆军,而且受技术限制,海军装备没有大的改进,只有在希腊火的使用方面尚可称道。可以说,利奥三世时期的海军制度改革有功绩也有不足。

利奥三世海军政策的功绩主要有二:

首先,最直接的就是增强了海军战斗力。718年君士坦丁堡保卫战后,拜占庭人多次袭击叙利亚和埃

及的穆斯林海军基地。739年,大约390艘战舰被派往攻击达米埃塔^⑧;747年,在意大利城邦舰队的协助下,拜占庭人决定性地击败了塞浦路斯附近的叙利亚与亚历山大联合舰队,重创了倭马亚哈里发的海军;随后,帝国摧毁了阿拉伯的北非舰队。随着倭马亚王朝的崩溃和伊斯兰世界的日益分裂,帝国海军成为地中海唯一有组织的海军。

其次,改革也为帝国提供了稳定的内政环境。727年,利奥三世借改革清洗了希腊和基克拉迪斯群岛海军中的圣像崇拜派,海军就此也倒向利奥三世,支持其发动的圣像破坏运动,因为军队大部分人赞成破坏圣像,而被君士坦丁宣布为帝国法律的——754年的破坏圣像宗教会议的决议,在拜占庭帝国的大多数民众那里仍有一定的影响。^[15]因此,即便是到伊琳娜皇后摄政时期,皇后在寻求终止圣像破坏运动时,也只能放弃首都而选择前往尼西亚举行宗教会议,以躲避军队的怒火。

利奥三世海军制度改革的缺陷主要有三:

第一,缺乏技术革新。利奥三世时期在船身设计方面缺乏重要突破,这就导致舰队可维持巡航的速度是有限的,且携带的补给量也是有限的。据估计,桨手每天水的消耗量为8升,较小的船只能够携带大约4天的水,这意味着舰队被限制在沿海航线上,并且必须经常登陆以补给淡水与休整船员。从贝利撒留对汪达尔人的战役到克里特岛的远征,都体现了水对于远距离作战的局限性。^{[6]360}显然,在这数百年间,利奥三世也没能解决这一问题。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安条克总督尼基弗鲁斯·乌拉诺斯(Nikephoros Ouranos)强调舰队的海外作战需要有“对海洋有准确知识和经验的人[...],哪些风使它加速,哪些风从陆地吹来。他们应该知道海中隐藏的岩石以及容易搁浅的地方和航行的陆地和与之相邻的岛屿、港口和这些港口之间的距离。他们应该了解周边的国家以及哪里有水源。”^{[6]383}据此,我们认为利奥三世时期海战本质局限于沿海港口作战,是为了配合陆军或抢占战略基地,而不是今天所理解的争夺“海权”。

第二,战略战术上推崇守势。如上所述,当海军装备上有较大漏洞时,那么就要采取谨慎的策略。正如马其顿王朝的利奥六世(Leo VI, 886—912)在汇集帝国数百年来的军事经验所作成的《战术》一书中给海军指挥官的建议:“如果您贴近敌人的领土,确信敌人就在附近,那么您必须要在远处配置陆上和海上的侦察人员。您必须保持警惕,保证安全,并做好集结阵型的准备”,^{[14]161}“您必须保持警惕,不要过于冒险进行阵地决战,特别是海战时。当舰船相接后,激烈的格斗将不可避免,而我们也不可能真正利用机遇。您须注意这一点,除非您对麾下快舰的数量和士兵的勇气有绝对信心,能够战胜敌人。毕竟舰船的数量和大小都不足以保证战斗的胜利,关键在于船上是否拥有能吃苦、坚定并愿意与敌人交锋的士兵。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要得到上帝的赐福与帮助。”^{[14]161}指挥官在海上作战中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安危。帝国即使数次战胜阿拉伯海军,也不能有效地扩大战果,这就导致阿拉伯海军还是能重新发起挑战。公元790年,帝国在安塔利亚湾之战遭受重大失败。哈伦·拉希德(786—809)统治期间,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岛再次遭到阿拉伯海军的袭击。同时,新的敌人也逐渐崛起:803年,威尼斯获得事实上的独立,并在809年击退拜占庭的进攻;北非突尼斯地区建立了新的阿格拉比德王朝,该王朝在整个地中海中部进行了突袭。^{[6]54}帝国建立的海军优势终究再一次丧失。

第三,帝国对海军建设缺乏热情。安纳托利亚大地主在高级军事和民事职位上拥有传统优势,相较于危险性高且来自他们领地范围外的海军,受他们控制的领地上征召的陆军无疑更加值得信赖。^{[9]105—106}这就意味着海军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拥有大贵族庇护的陆军的附属部队,因而使得海军长期备受冷落。

结语

综上所述,利奥三世在内乱初平、外敌入侵的背景下,将海军由原本战斗力低下且参与反对其改革的卡拉比西安改革为稳定可控的基比拉奥特军区,并凭借改革后的军区多次战胜阿拉伯海军甚至于重夺地中海海军霸权。然而,在10世纪后期和11世纪初,随着东方战线的稳固,皇帝们发现与维持一支高成本的常备舰队相比,呼吁盟国或附属国提供海军力量的成本要低得多。因此,皇帝们选择将东部战线的资源来供给

巴尔干地区的陆地战事,其结果是帝国舰队的数量在11世纪大大减少,之后海军军区最终难逃废除的命运。其灾难性后果在1202—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运动中显露出来:由于帝国缺乏必要的海军支持,十字军轻而易举地冲破了金角湾的封锁铁链,并占领了首都君士坦丁堡。1261年,巴列奥略王朝的米海尔八世重建帝国后试图重振海军,但只取得了暂时效果。到14世纪中叶,帝国舰队最多只剩几十艘战舰,爱琴海的控制权移交给了意大利和奥斯曼海军。纵观拜占庭帝国历史,可以看出利奥三世的海军制度改革,在短期上确实帮助拜占庭帝国重获地中海制海权,但不管是在海军技术方面还是在海军战略战术方面,帝国仍缺乏突破性变革,利奥三世时期海军的辉煌已是最后余晖。

[注 释]

- ①在拜占庭帝国的历史中,“黑暗时代”特指自萨珊库斯劳二世发动入侵后百余年的历史。帝国在此阶段经历萨珊波斯、穆斯林等势力的轮番入侵,数次濒临亡国,在此期间史料奇缺。关于黑暗时代的论述,参见庞国庆:《拜占庭帝国黑暗时代的人口危机及其治理》,《世界历史》2022年第6期。
- ②关于古典罗马帝国海军舰队的详细信息,参见[英]莱斯利·阿德金斯,罗伊·阿德金斯:《探寻古罗马文明》,张楠等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04—151页。
- ③乞里奇亚:土耳其共和国东南区域,靠近叙利亚,得名于曾居此地的推罗王子希利克斯(cilix)。
- ④南斯拉夫学者奥斯特洛格夫斯基在其著作中曾三次使用了“卡拉比西安军区”的称谓。参见[南斯拉夫]乔治·奥斯特洛格夫斯基:《拜占庭帝国》,陈志强译,青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 ⑤黎凡特地区:黎凡特原意是“东方”的意思,指地中海东岸地区即今天黎巴嫩、叙利亚一带。
- ⑥马尔代特人:生活在如今叙利亚地区的游牧部落,曾在拜占庭与阿拉伯的交流中扮演重要角色。详情参见Milos Cvetkovic, “The Settlement of The Mardaites and Their Military-Administrative Position in The Themata of the west: A Chronology”, *Zbornik radova Vizantološkog instituta*, 2007, pp.65—85。
- ⑦维利亚的伊西多尔:西哥特王国的主教兼学者,在语言学方面贡献巨大,著有《词源》一书。其生平参见张卜天:《拉丁西方的百科全书之最——伊西多尔的〈词源〉评述》,《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3期。
- ⑧达米埃塔(damietta),今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杜姆亚特省首府,处在地中海与尼罗河的交汇处,是埃及的著名港口城市之一。

[参考文献]

- [1]Haldon John.Warfare,State and Society in the Byzantine World,565—1204[M].UCL Press,1999.
- [2]Treadgold Warren.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73.
- [3]Nesbitt John.South of the Balkans, the Islands, South of Asia Minor.Washington, DC: 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J].Catalogue of Byzantine Seals at Dumbarton Oaks and in the Fogg Museum of Art,1994,(2):150—151.
- [4]Ahrweiler.Byzance et la mer.La marine de guerre, la politique et les institutions maritimes de Byzance aux VIIe—XVe siècles [M].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96.
- [5]Gardiner,Robert.The Age of the Galley:Mediterranean Oared Vessels since pre-Classical Times[M].Conway Maritime Press, 2004.
- [6]Pryor,John H,Jeffreys,Elizabeth M.The Age of the ΔΡΟΜΩΝ[M].Brill Academic,2006.
- [7]陈韵.拜占庭军区制的起源与早期特点研究[D].广州:中山大学,2022:9.
- [8]Casson.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M].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15.
- [9]Pryor,John H.War at Sea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M].Boydell Press,2003.
- [10]Treadgold,Warren T.Byzantium and Its Army,284—1081[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72.
- [11]Kazhdan.Oxford Dictionary of Byzantium[M].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 [12]MacCormick.Origin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A.D.300—900 [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413—414.

- [13] Basch. 6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Ship Construction in Antiquity [M]. Hellenic Institut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Nautical Tradition, 2001.
- [14] [拜占庭] 利奥六世. 战术 [M]. 李达, 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8.
- [15] [美] A.A. 瓦西列夫. 拜占庭帝国史 [M]. 徐家玲,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409.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Reform of Naval System in the Period of Leo III

HU Chang-jiang, ZHANG Ye

(College of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After defeating the invading Arab armies, Leo III, the founder of the Isulian dynasty, took advantage of the Karabisianoi naval rebellion and launched a series of reforms, exerting a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the Byzantine naval system. As a result, the originally obscure and ineffective karabisianoi Navy was transformed into the Cibyrrhaeots Military district with fixed administrative area, explicit administrative structure and high military capability. Subsequently, the navy of the Arab Empire was defeated several times and the Byzantines regained the naval hegemony in the Mediterranean, bringing them ambitious again during the dark age. However, in terms of the overall status of the navy in the empire, the navy was still subordinate to the army after the reform. As for the naval strategy, though having defeated the Arab navy many times, the Byzantine navy still maintained defensive; Moreover, Leo III made few reformations of naval equipment.

Key words: Leo III; Byzantine Navy; Karabisianoi; Cibyrrhaeots

[责任编辑 葛 鑫]